

多元智力视域下的《时震》媒介分析¹

刘 丽

(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后现代主义社会是一个媒介社会。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时震》中使用多种媒介形式表达了对人类智力的深切关注。本文基于媒介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技术批判理论,从多元智力的视角阐述了《时震》中再现的印刷文化媒介与人类智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冯内古特认为印刷文化能够促进人类智力能力和情绪智力的发展,帮助人类有效应对后现代社会无序现状。同时,品析《时震》中蕴含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 库尔特·冯内古特;《时震》;尼尔·波兹曼;媒介生态学;多元智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是一位“极强的鬼才作家”^[1]。封笔之作《时震》(1997)充满了冯内古特式的“冷峻的滑稽和敏捷的思辨”^[2]。学术界对《时震》已经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如基尔戈·特劳特的反英雄形象、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小说主题分析等,大大加深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但是,目前学界运用媒介生态学解读《时震》的研究并不多。学者陈世丹详细阐述了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通过运用121幅自绘插图媒介营造视觉化效果对美国文化进行了批判。^[3]学者罗小云虽明确指出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散文、诗歌、绘画等方式表达其未来学说,但未结合《时震》从媒介的角度进行深入论述。尼尔·波兹曼说媒介即隐喻,“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4]。因此,将媒介维度引入文学作品的解读,既能增加文学的整体性又能充实文学内涵。

本文将从多元智力的视角,运用媒介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技术批判思想解读《时震》中的多种媒介符号的意义,揭示出冯内古特对后现代社会人类智力状况的人道主义关怀。

一、尼尔·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概述

媒介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重要理论思潮,主要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认知、理解、感受和价值观以及人们与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人类的生存。但凡能够负载信息的载体都是媒介。

尼尔·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他的《娱乐至死》从媒介的偏向性、媒介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批判了导致美国文化娱乐致死的电视媒介,捍卫了印刷文化的成就。他坚定地认为,“印刷术控制下的话语是书面形式,意义丰富、内容严肃。铅字那种有序排列推

¹ 收稿日期: 2019年12月16日

作者简介: 刘丽(1980-),女,河南驻马店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经济学术团体联合会资助项目《冯内古特〈时震〉中的媒介再现与主题建构》(项目编号: SKL-2018-1732)。

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是波兹曼技术批判思想的核心内容，波兹曼强烈地批评了技术对人的生活、思维、精神以及道德的控制，忧心忡忡地提醒人们对技术的发展要始终保持警惕，因为失控的技术增长将使文化失去道德根基，摧毁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威胁人类的生存。

声称自己是“卢德”分子的冯内古特一直对科技保持批判的态度，他在《时震》中敏锐地指出科技对人类智力带来的威胁，使用了书信、小说、名言引用、多国语言文字和艺术家姓名等多种印刷媒介表现形式，坚定地捍卫人类智力领地，体现了温暖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时震》中的书信和多国语言文字——捍卫人类智力阵地

瑟斯顿将人类的智力能力分为记忆、流畅、推理、知觉、空间、数学和言语七种，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性的核心是抗击理性，写作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是非情感的。不过波兹曼坚定不移地认为印刷文字是一些印在纸上的冷静的抽象符号，所以阅读从本质上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非语言游戏。冯内古特通过使用书信和外国文字两种印刷文化媒介，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印刷文化对捍卫智力阵地的重要价值，展现了文字的人性温度。

（一）书信的温度

书信曾是人类智力和感情的重要载体之一，但逐渐被电子媒介取代。作者在《时震》后记中全篇摘录了“我”对亚历克斯叔叔的回信，重温了书信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封标准的商务信函，语言本该委婉礼貌，可是信中却充斥着不敬或粗俗之词，如“鸡毛蒜皮”、“可怜的家伙”、“急吼吼”和“屁”等，流露出对收信人的不屑与揶揄。读者边读边会思索，“为什么把伯纳德·冯内古特称为‘可怜的人’”、“为什么把通用公司寄来的一美元称为‘屁’”、“写信人为什么会如此愤世嫉俗”。带着这些问题，读者依靠鲜活的智力推理能力，通过将文本与现实、历史联系起来，试图理解作者的深意。

伯纳德·冯内古特是“我”的兄弟，为人风趣，其显赫名声是被媒体制造出来的，所以“我”用“可怜”一词修饰伯尼，揭露出在强大的媒体面前，个体就像“鸡蛋壳”毫无还击能力。亚历克斯叔叔去信索要照片一事反映出后现代社会中图片、海报、照片等图像对人们的兴趣占领和印刷文字的没落。作为记者的“我”举步维艰，变得愤世嫉俗，亚历克斯叔叔成为“我”对衰败的文化氛围发泄不满的替罪羊。与其说亚历克斯叔叔被气得“吼吼叫”，不如说是“我”的歇斯底里。信末的“屁”流露出“我”对以通用公司为代表的科技的鄙夷。盖伊·福克斯是英格兰火药阴谋中的关键人物，被判叛国罪。“我”用盖伊·福克斯之名坚定地表达出对文化现状的挑战。气得暴跳如雷的亚历克斯叔叔得知真相后把它转交给了伯尼，“我”才保住饭碗。

这封信辗转于大家庭成员之间，成为情感沟通的媒介，表达出家人之间相互包容和照顾的浓浓温情。读者借助推理能力体味出信中暗含的动人温情，获得此心同此理同的默契，真实圆满地获得了智力发展。

（二）语言的行动力

心里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武器。波兹曼认为电视话语是“精神分裂症式”的，在此媒介影响下，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呈现出了破碎、混乱的精神分裂式特征。国内外的智力研究发现智力具有可塑性，通过开展如思维训练、言语训练等智力训练能够延缓智力的衰退。所以，在《时震》中冯内古特为了抵制后现代社会中由电子媒介带来的整体智力低下，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目的地使用法语、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古希腊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对自己进行智力训练，既揭露了现实环境，又实现了自我扩充。

例如：第 35 章提到单击者作家职责时冯内古特引用了法国作家伏尔泰的“II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替自己发声；第 26 章中使用了拉丁文“Homo sapiens”，“Homo sapiens”意为智人，作者使用生僻的拉丁文意在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调侃了人类的无知；第 27 章中冯内古特使用“Eureka”描述苏诺科发现聪明大脑的原因时兴奋和喜悦之情。

着重分析其第 27 章中的用法，会发现“Eureka”是希腊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发现可根据比重原理测量金子纯度时的惊呼，其由此发现了浮力定律，为人类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苏诺科认为人类聪明的原因是“内耳侧的不大于一颗芥籽的一小块鼻涕颜色的隆起物”^[5]。冯内古特将苏诺科的发现与阿基米德的发现通过“Eureka”并置，意在与阿基米德形成反差，对当代人们的智力水平进行犀利的反讽。智力的生理载体大脑也沦落为“只不过是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仅够狗当一顿早餐”^[5]。大脑不再是智力的来源，人们依靠内耳侧的芥籽大小的隆起物接收智力的无线电波，向“学校的优等生、电视智力竞赛的参加者输送了正确答案”^[5]。

正所谓“哀其不幸”，冯内古特用刺耳的表述流露出对后现代社会智力现状的担忧。正所谓“怒其不争”，他用辛辣文字刺痛读者，然后才能痛则思变。所以严肃作家冯内古特通过灵活使用书信和多国语言捍卫了人类思维的领地，彰显了人类智力的行动力。

三、《时震》中的书籍——增强情绪智力

Goleman 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中介能力，对发挥人们的各种能力和智力有决定性作用。Baron 则认为情绪能直接影响人的整个身心健康，并将情绪智力概括为五大维度：个体内部成分、人际成分、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成分和一般心境成分。个人内部成分包括情绪自我觉察、自信、自尊和自我实现；人际成分包括共情、社会责任感和人际关系三个相关能力；适应性成分包含三个相关的能力：现实检验、问题解决和灵活性。压力管理能力包括压力承受和冲动控制；一般心境成分包括幸福感和乐观主义。^[6]冯内古特在小说中多次提出在后现代社会里，科技使人失去了尊严，造成了人们的孤独和异化。对此他提倡回归书籍，因为书籍能增强人们的情绪智力，改善人际关系，保持心智健康。

《时震》中基尔戈·特劳特的科幻故事《B-36 姐妹》令人印象深刻，讲述了布布星球三姐妹的故事。布布人起初深受画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两姐妹的影响，依靠读书和艺术来教育孩子，布布人充满了温情和想象力，是该星系中适应能力最强的。第三个姐妹是科学家，因为嫉妒两个姐姐，发明了很多邪恶的器具，如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等，让想象

力成为多余。布布人不再继续培养想象力了，因为只要按下开关各种热闹放纵的“蹩脚货”就都有了，她开始觉得纸张和绘画既单调又死板，难以获得快感。于是，第三个姐妹又继续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等。结果，布布人失去了想象力和同理心，变成了当地星系中最冷酷无情的生物。

《B-36 姐妹》传递出两方面信息，以下详细列举。

（一）传统媒介：同理心的载体

一方面，阅读和艺术这些传统的纸质媒介可以让人充满温情和同理心。“温情”和“同理心”对应人际成分中的共情。只有具有“此心同此理同”的同理心，人与人之间才能相处融洽，充满温暖。正如冯内古特在接受《别笑》杂志采访时所说，“来吧，投身一种艺术，不管你做得多差或是多好，它都会让你的灵魂生长”^[5]，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才能成长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例如《时震》中的作家特劳特，其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虽已八十四岁高龄，仍像十四岁一样充满好奇和欢乐，文思泉涌，常被自己的作品震撼。所以他在时震后重播带来的大灾难中毫发无损，是首先获得自由意志的人，也是第一个具有行动力的人，并不断唤醒他人立刻投入拯救世界的使命中来。特劳特的可爱救世主形象印证了书籍的强大能量，即“印刷书籍比任何其它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5]。

冯内古特从个人内部成分、人际成分和一般心境成分三方面描述了自己从纸质阅读中获得的奇妙的情绪感受：阅读是一场“需要我们用手、用眼、用脑、用心去进行的精神历险”^[5]。写作就是“用笔墨同人进行纸上交流”，就像与素昧平生的人进行“初次约会”，应该“友善热情，让人感觉愉快”^[5]。书中汲取的精华使他获得自信和自尊，感受到“活着是一种荣耀”；书中的人让他充满乐观，“感到几乎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我遇到的那些圣人——那些无私而又有为的人。他们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5]，重获得“生”的动力。

此外，冯内古特用书籍构建了一个“共情”命运共同体：“我大致同你一样感受事物、思考问题，关心的事情中有很多也是你所关心的。……你不孤立。”^[5]其帮助人们提高压力管理能力，应对后现代社会的无序压力。《时震》中一共提到了大约 60 位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名人的作品或者名言，如马克·吐温、亨利·大卫·梭罗、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等。这些艺术家来自非洲、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智利等国家，构成了一个不分种族和国籍的大家庭。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我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5]。作者对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熟稔于心，信手拈来，好不快活自在，因为书中的台词、情景都成了作者“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5]，帮助他解决问题，提高适应性。

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描述到让人生无可恋的社会现实时，其立刻引用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芸芸众生，求存于无声的绝望之中”^[5]。当作者告诉特劳特自己的姐姐哥哥与父亲的紧张的关系时，特劳特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的名言：“忘恩负义之逆子，甚于毒蛇利齿”^[5]。

在第 36 章中，他引用社会主义党候选人尤金·德布兹的话表达自己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只要还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5]。

每一次名言引用都是作者和这些作家的互动。这些在印刷机文化鼎盛时代里光辉灿烂的名字无疑给作者带来了“家”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在荒诞的后现代社会中，纸质阅读和文学创作使人获得移情式的交流，带给人们无尽的温暖，获得幸福感，赋予人们有效应对社会现实的精神力量，重返身心健康。但是现今的人们大部分阅读时间都被电子屏幕霸占了，作者通过特劳特之口给出忠告“你得了病”，发出了“行行好，行行好，请再等一小会儿”^[5]的请求，迫切地呼吁人们重拾书籍，延续印刷文化。

（二）科幻：另一维度上人类社会的预言

另一方面，冯内古特借助科幻小说将人类社会从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延伸，并以此来预测人类的危机。冯内古特认为科学家的过度专业化会造成科学家的道德空白，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物。

《B-36 姐妹》虽然发生在外星球，可实际指涉的是地球上当今的人类社会，因为布布人的书写文字很像地球上的英语。第三个姐妹身为科学家，一心报复两个姐姐，潜心发明了很多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又无需动脑的“蹩脚货”使布布人无法再从别人的脸上读出饶有趣味、感人肺腑的故事，无法体验、察觉他人的情感和意图并做出相应反应，严重地损坏了布布人的情绪智力。而且缺乏与他人的共情心，也会造成历史感的断裂。历史就是由过去一个个充满鲜活生命力的人和事组成，是人际互动的媒介。与布布人的遭遇类似，现代人的大脑也正在被电子媒介重塑，已经被改造成不会记忆了，这就是《时震》中斯蒂夫·亚当斯的切身感受。

斯蒂夫几番周折后终于明白，他为电视编写的所有喜剧段子必须来自电视本身大加渲染的事件，而且是不久以前。如果喜剧料子来自电视上一个月前或更长时间未出现过的其他素材，那么尽管配音笑声不断，观众也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他们为何发笑。猜猜怎么回事？电视是个擦除器。^[5]

电视能把过去甚至最近的过去从头脑中擦除，表面温和的科技虽然能够为人们提供瞬间快乐，但也使人们忘记历史。198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切斯瓦夫·米洛什在获奖感言里说这是个“拒绝记忆”的时代。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同样慨叹现代人对历史已经毫无兴趣，因为历史对他们而言毫无使用价值。《时震》中作者缅怀他初当作家的时代，那时每当他提及过去，甚至是遥远过去的事件和人物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会做出正面或负面的情感上的反应。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但现代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获得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成为一个情绪智力稳定、充满智慧的个体。

结语

冯内古特在《时震》中采用多种媒介形式聚焦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智力状况，号召人们在后现代社会中坚持纸质文本阅读，坚守智力，提高情绪智力，积极建构“使人活着还有点意思”的世界，饱含了人道主义关怀。冯内古特已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将继续对世界文学发挥深远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冯内古特, 库尔特. 冯内古特: 最后的访谈[M]. 李爽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41.
- [2] 虞建华. 冯内古特新作《时震》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J]. 当代外国文学, 2000(3): 146-151.
- [3] 陈世丹. 后现代文学中的媒介再现和建构[J]. 外国文学, 2012(2): 124-132.
- [4]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11, 63, 38.
- [5] 冯内古特, 库尔特. 时震[M]. 虞建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63.
- [6] 徐小燕, 张进辅. 情绪智力理论的发展综述[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8(6): 77-82.

LIU Li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postmodern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by various media, Kurt Vonnegut used a variety of media in *Timequake* to express his deep concern over human intelligence. Based on Neil Postman's medium ecology,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dia of printed cultur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from multi-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It concludes that for Vonnegut printed culture can dramatically promote human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 thus helping human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chaos in postmodern society. *Timequake* reveals Vonnegut's keen humanitarian concern.

Key words: Kurt Vonnegut; *Timequake*; Neil Postman; medium ecology; multi-intellectual theory

(责任编辑: 白梦然)